

日本文化与现代化丛书

日本文化的杂种性

〔日〕加藤周一 著



心代
少
あ
少
不
知

日本文化的杂种性

〔日〕加藤周一 著
杨铁婴 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日本文化的杂种性

加藤周一 著

杨铁婴 译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春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7.5印张 插页4 165,000字

1991年3月第1版 1991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200册

I S B N 7-206-01051-2

G·174 定 价: 3.80 元

《日本文化与现代化丛书》总序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实现了现代化，其成功的主要经验是最终避免了“全盘西化”和“全盘国粹化”，使其文化传统的创造主体，在现代化中起着动力机制的作用，在实践中确立了自己的现代化模式，即“民主主义原则、技术文明和日本文化传统相结合的形式。”（加藤周一语）也就是说，以民主主义为基础，以高度技术文明为手段，以日本文化传统作为根本。简言之，就是大文化起着主导的作用。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日两国社会制度不同，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各异，但日本在现代化进程中坚持本国文化传统，建立与西方文化“对立·融合文化模式”，并发挥着创造的主体作用，也许还有值得借鉴的地方。因此，我们特邀日本著名学者、评论家加藤周一先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叶渭渠先生、副研究员唐月梅先生合作主编《日本文化与现代化丛书》，以供读者思考、研究日本之经验，努力探索我国现代化的模式，使我国早日实现现代化。

本丛书的出版，承蒙加藤周一先生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以及叶渭渠、唐月梅两先生的通力合作，在此一并鸣谢。

编者

目 录

总序.....	(1)
日本文化的杂种性.....	(1)
杂种的日本文化之希望.....	(21)
现代日本文明史的位置.....	(35)
“现代化”何以必要.....	(59)
关于“赶上”先进国过程的结构.....	(66)
现代的社会与人的问题.....	(95)
城市的个性.....	(111)
战争和知识分子.....	(136)
日本人眼中的世界.....	(175)

日本文化的杂种性

在西欧参观访问期间，我曾经思考过有关日本文化的问题。我认为日本人与其研究西方问题，不如研究日本的问题，并以这种研究来促进工作，在自己的学术和艺术上更具有建设性。而且，到了现代日本，日本的固有文化反而成为问题，这些问题比起西方的文化和问题来，并非毫无意义，相反，有些地方是很有意思的。过去之所以没有注意，尽管有种种说得过去的理由，但是从我本人来说，至少是由于怠惰的缘故。从现在起，我要开始工作，以补回由于我的怠惰而造成的损失。至于古代的日本和今天的日本在什么地方有什么意思这类具体问题，在工作进行过程中将会一点一点地明确起来的。在这里我就不想从抽象的原则来谈论了。

不过，从西欧参观访问回到了日本，我的想法也有一些改变了。准确地说，原则并没有改变，但是在一般的日本文化问题上，我访问西欧期间所思考的问题，同回来以后所思考的问题，在内容上产生了一些分歧。在我确立了日本人必须站在日本人的立场上的这一原则之后，就是说，在确立了即使以日本的西方化为目标来进行工作也决不能解决日本的问题这种思考原则之后，这种分歧就关系到所谓日本人的立

场究竟是什么这个内容了。访问西欧期间，我就此按照没有西方影响的日本方式进行过思考。我所以这样思考，是因为我认为西方的影响，除了技术以外，在精神上、文化上都仅是些表面的、肤浅的东西。我眺望着身边的西方的大街。它们同东京的西方大街毫无共同之处。在日本如果想起与它是相象的东西，那就不外是想起了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外形——京都栉比鳞次的古老房屋。不限于是大街；谁也不会愚蠢到去谈论比较塞尚的仿制品和塞尚的原作吧。如果说访问西欧期间想起了日本的绘画，也不外是追溯到北斋、追溯到光琳^①。对于那种扎根于日本风土和古老历史的东西的思考方法和感受性，以及全部的风俗艺术，心里很自然地就产生自觉地提起它们的冲动。如果把这种冲动叫做国民主义，那么，我在访问西欧期间思考日本人的立场时，其内容就是国民主义的。我的那种想法，是生活在英法两国期间受到这两个国家人民对自己国家文化采取极端的国民主义态度很大的刺激。我已报告过多次，这里不再列举事例了。总之，英国式的特色是从学术、艺术到服装，甚至反映在生活方式的细节上；英国的文化不象日本那样的混杂的东西，医学是外国式的，美术是另外一个外国式的，而生活方式却是日本式的。所以，他们做任何事都不轻薄，沉着镇静地肩负着悠久的历史。把英国换成法国，大体上也可以这样说。在英法两国，自然也不是没有轻薄的现象，然而不言而喻，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不过，几乎所有曾经在两国旅游过的旅游者在同日本进行比较时，至少会注意到这两个国家的文化

①北斋：指江户后期的画家葛饰北斋（1760～1849）。光琳：指江户中期的画家尾形光琳（1658～1716）。

纯粹是由传统的东西培育起来的。在英国和法国，人们也分别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领域，对外国文化抱有强烈的好奇心。但是，在多数情况下，那不是向外国寻求对本国文化不可或缺的原理，而是要通过同外国的接触去进一步丰富和拓展本来的原理。关于原理，看来英语文化也好，法语文化也好，都是纯种，似乎没有受到过英语和法语以外的任何东西的影响。许多英法人士或多或少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一种文化国民主义便从这里发展起来。对心理学多少感兴趣的旅游者当然是会注意到这一点的吧。所以，他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关于文化问题，日本人也必须象他们那样，是国民主义的。事实上，过去已多次提出过这种结论，我在访问西欧期间也倾向于这样的结论。但是，这是错误的。——在我来说，夸张地说，当船返回日本，我站在甲板上开始看到日本海岸的那一瞬间才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

可以称得上对日本的第一个印象是：一方面是迫近大海的山和水边的松林、隐现在松林背后的渔村的白墙、那个水墨山水画常常描绘的古老而美丽的日本，是与欧洲完全不同的世界；另一方面，船从玄海滩一进入关门海峡，船的右侧便呈现北九州的工厂区、林立的烟囱冒出的烟柱和高炉的火光以及活跃而勤奋的国民所创造出来的所谓“现代的”日本。这是和马来完全不同的世界。在神户登岸以后的印象也完全一样。神户既与马赛不同，又与新加坡有异。从外观上说，新加坡比神户更接近马赛，因为新加坡是殖民地。新加坡的西方式的大街，并不是马来人为了自己的需要由自己的双手修建起来的。对这样的殖民地来说，从原则说，问题是很清楚的：要么是殖民地，要么是独立国家；要么是来自外国的舶来品，要么是国产产品。假如在这种地方，文化成为

问题的话，那么，只能纯粹是国民主义方向的问题。但是在神户，事情却不那样简单。港口的栈桥也好、起重机也好，大街的西式建筑物也好、风俗习惯也好，一切都是日本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由自己的双手创造出来的。新加坡的西式文物，都是为了西方人，一切按照与马赛同样的尺寸建造的，而在神户则都是按照日本人的尺寸建造的。西方文明以那种方式在亚洲扎根，除日本以外，恐怕再也没有别的地方了吧。她既与马来不同，也与印度、中国不同。我从外国回到日本的时候，这种不同比西欧和日本的不同更加强烈地激荡着我的心。在西欧生活的时候，总有这样的倾向：比较西欧和日本，是以传统的古老日本为中心来考虑日本式的东西。但是回到日本一看，我却这样想了：日本式的东西还必须向与其他亚洲各国的不同去寻找。就是说，向日本的西方化正在纵深发展这一事实去寻找。这决不是把注意力从传统的日本转移到西方化了日本。不是这样，而是开始思考：日本文化的特征难道不是在于她的两大因素在深处交织在一起，任何一方都难以去掉这一情况本身吗？这就是说，如果把英法的文化看作纯种文化的典型，那么，日本的文化不正是典型的杂种文化吗！在这种情况下，我对杂种这个词既不赋予好的涵义，也不赋予坏的涵义。对纯种一词也一样。如果从是好是坏的立场来说，那么，纯种也有坏的一面，杂种也有有意义的一面，反之亦然。但是，在谈这种问题之前，有必要明确一点：所谓杂种，即指在根本上而并非枝节问题。至于枝节，那么，英法文化也并非没有受到外国的影响。印度和中国的情况更是如此。因此，没有理由把日本文化特别区别开来，说它是杂种的典型（虽然关于印度和中国的情况，如果不再进行些调查研究，就不能下断论；但是就截至

目前我的理解来说，它们的情况和 日本 的情况是显然不同的。）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西方种的文化如何深入地培育了日本的根，其证据充分表现在这样一点上：企图去掉这种西方种的日本主义者，无一例外地都是极端的精神主义者。是会有人解释日本精神和纯日本风格的文学艺术的，但这些人却不去解释纯日本风格的电车和选举。因为那是不可能的事。人们所说的日本风格，通常都是精神方面的东西。实际上，歌颂日本传统文化的人，写文章却不是用毛笔而是用钢笔，他的书不装帧成日本式而装帧成西方风格的。至于销路问题，则令人感到资本主义机构的作用，在英国已是典型地发挥出来，而在日本则“被扭曲了”。也许是日本人在书斋里穿和服，但在外出时则是穿一身西装。总而言之，西方种的文化早已以不可挽回的形式深入到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政治、教育以及其它的制度和大部分的组织机构也都是采取西方型而建立的。我似乎有些絮叨，但是，有的人认为今天的日本经济结构尽管带有“前现代的因素”，但不管怎样它已经发达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唯有精神和文学艺术却有可能按照纯日本风格去发展。这种人如果不是相当的精神主义者，那就很难理解了。日本主义者必然成为精神主义者，他们只能这样考虑：不管日常生活和基础结构如何，精神本身是会独立地产生文化的。但是我们注意到，根据这样的考虑而进行论争的材料，立论上不可或缺的概念，大部分都是从西方传来的，距离日本风习是很远的。不使用自由、人性、分析、综合之类的概念，光凭着议论的题目，是不可能组织一篇能够说服别人的文章吧。企图整顿日本文化的杂种性而使之复归于日本传统的日本主义者的精神，已经是由翻译的

概念所培育的杂种，如果去掉翻译的概念，那么，活动肯定会立即停止。在今日日本，要从日本传统文化的影响下有区别地加以选择，是绝对不可能的。

群众是很懂得这一点的。所以，他们全盘地接受杂种，而且想方设法使自己的生活方式舒适，对杂种却不抱有要使之纯化的狂妄希望。但是，所谓知识分子却奋起，对此抱有很大的希望。知识分子越是意识到文化问题，就越是从某一方面攻击日本文化的杂种性。他们倾向于这样的观点：如有可能就想纯化它。一言以蔽之，明治以来复杂的文化运动的历史，是来自知识分子方面对这种文化的杂种性的反应。就是说，这不外是文化的纯化运动的历史。正因为如此，它是必然失败的历史。

二

日本文化的纯化运动，姑且用图解式区分为两种类型来加以考虑。第一种类型是基于要除掉日本种的枝叶而使日本西方化的愿望；第二种类型则相反，是基于要清除西方种的枝叶而留下纯粹日本式的东西的愿望。但是，这两愿望当然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企图去掉日本种的枝叶的纯化运动即使进展顺利，也不可能把滋养根和干的日本因素除掉，日本种的枝叶不久还是会生长出来的。因此其后兴起清除西方种的枝叶而按照日本式整理体裁的运动，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对根和干的杂种性也无能为力，无法防止西方种枝叶仍会再生出来。所以，这种作用和反作用的连锁反应便无休止地继续下去。明治维新以来，企图使日本文化全盘西方化的风潮一起来，便产生了主张尊重日本式的东西的

反动。这两种倾向的交替，看来至今依然没有停止。

切断这种恶性循环的出路，恐怕只有一条，那就是完全放弃企图纯化日本文化的愿望，不管是全盘日本化还是全盘西方化。英法文化是纯种，这很好。日本文化是杂种，这也很好；纵令现在不很好，但是我们可以确定这样的方针：今后要把她培育成很好的东西。人们也许会说：那样的事不可能吧？但是，不去干一干，就无法知道，而且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如果图解地说，结论就是这样。不言而喻，实际的问题并不象图解那样简单，在下结论之前，还有必要再详细看一看纯化日本文化运动的实际情况。

日本文化同西方文化的接触，是在维新前后受到来自外部的强制和来自内部的技术需要的刺激才发生的。除了例外的情况明治的思想，在吸收西方文化、日本西方化的过程，与国民主义的理想之间虽然已经包含着对立的方面，但是主要还保持着相互协助的关系。所谓西方文化，主要是技术文化，因为技术文化是作为国民主义的工具，加强它是有用的。“和魂洋才”这一提法最好不过地表明了：明治的文明开化思想同富国强兵的理想是多么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但是应该吸收的西方文化一旦超过技术、制度的范围而及于精神领域，那就同富国强兵的理想互不妥协，并由此而唤起了更细微而深刻的国民主义的反作用。其典型的事例就是基督教传入的情况。反作用通常是极其巨大的，所以，基督教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停留在有限的范围之内（如果其影响扩大到了广泛的范围，那么，其后的日本文化历史自然就会改变。但是，为了要进行这种设想，明治时代来得太迟了，恐怕不是在19世纪末的东京，而是早在16世纪后半期的九州已经失去了日本基督教化的机会）。

但是一般地说，吸收技术、制度的到了一定程度，被吸收的东西开始自发地起作用，即使不象基督教那样直接迫使接受的一方改变其精神，但是也必然会间接地使其生活情感发生变化，风俗习惯发生变化，道德和美的意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传统的东西吧。“和魂洋才”这一原则早已不能象文明开化初期那样简单地成立了。日本精神成了必须有意识地去捍卫的东西，而且成了只有通过同纯技术领域以外所有西方化的东西相对立才能捍卫的东西。这时便开始出现了作为纯化日本文化运动的一种类型的国民主义。

一种类型出现之日，也就是另一种类型出现之时。因为在吸收技术、制度之后，为了在被吸收的技术、制度所产生的社会生存，就必然开始吸收必要的思想。洋才同和魂的矛盾刺激着人们对洋魂的理解，并在同国民主义尖锐对立的情况下，作为企图将日本文化广泛西方化的运动而出现。例如，西乐同日本音乐、西洋画同日本画几乎以不可调和的形式对立着。如果说在感受性和美意识的领域里已经如此，那么，同样的道理就不能不涉及到道德的领域，从而也涉及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演变的趋向随着引进历史主义，日本社会西方化这种观点似乎已经拥有决定性的强大的影响。——根据历史主义或者说历史性的观点，所谓日本的西方化，就是日本的现代化。为什么呢？因为在应该循序发展的历史阶段上，西方是处于先进阶段，日本是处在落后阶段。落后就必须追回失去的时光，必须清算日本自身中的封建性以及翦封建性，使国家彻底地现代化。企图纯化文化而不倾向于国民主义方向的人们，倾向于这种意义上的现代主义，而两种倾向随着各自的极端发展，就越来越激烈地对立着。

在最近的文化运动中表现出各种各样对立的因素，例如

传统的趣味同革新的趣味、非历史性的观点同历史性的观点、对社会的保守性立场和进步性立场——从西方文化同日本的关系这一点来看，这些对立因素的大部分，似乎可以还原为以上两种类型，即国民主义同现代主义的对立。不言而喻，这两种类型是以最明确的形态和以最庞大的规模表现出来的，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占领期间是其开始时期（所谓开始时期，是战败后，狭义地理解是1947年镇压2.1罢工以前，广义地理解是1950年朝鲜战争开始以前。在这里没有必要把这两者的不同当作问题提出来）。直到战争以前，国家政权不曾有组织地介入文化的所有领域。以天皇制为中心的富国强兵政策教育是很彻底的，但是在思想文学艺术领域中，政权的介入仅止于在必要时进行镇压，还不具备象战争期间的“精神总动员”那样的性质。一部分知识分子企图把文化建立在日本式的传统基础上而加以纯化，这种文化国民主义乃是他们对文化的杂种性的一种反应，可以说它与大众没有深切的关系。政权对这种事也并不热心，但是随着战争的发生，也进行了精神动员。文化国民主义作为加强政治上的国家主义的工具，受到政权的积极支持，并以前所未有的庞大规模被加以强调。文化上的国民主义早已不再是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爱好，而是已经成为同大众的一种联系了。战后，在完全不同的背景下，针对这种“国民精神总动员”，以庞大的规模展开了“日本的民主化”。这一次，同战争期间的情况不同，同大众的联系则是以来自大众方面的自发支持为基础。——这一点，至少在某一方面可以这样说。总之，以战争为契机，文化问题成了被自觉地或有组织地对待的问题。于是出乎人们的预料，由于日本文化性质本身而产生的两种反应类型，即国民主义型和现代主义型采取无可置疑的明

确形式相继出现，这是非常典型的。

如果把话头限制在思想和文学领域，那么，在战争期间，为了进行“国民精神总动员”，就是说为了使战争合理化，接受了在吹捧天皇的同时吹捧日本文化这一任务的，主要是京都的哲学家一派和日本浪漫派一派。于是，哲学家们使用西方哲学所训练出来的方法，把天皇制“现代化”了。所谓“超国家主义”，只不过是舶来的零件组装起来的东西。但是，这种情况对于纯粹日本主义者极不合适却不是新鲜的东西。可以说，它在维新前后尊皇攘夷论的发展过程中就已经表现出来了。同传统的封建社会秩序结合在一起的尊皇论，发展成为同封建性相对立，似乎是要制造出现代的国家主义，这种革新的尊皇论不过是适应时代的要求罢了。总之，如果仅仅依靠传统的日本文化遗产，那么就连明治的富国强兵的国家主义也制造不出来。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国家概念本身是“先进国”历史地创造出来的。那时，“和魂洋才”作为原则之所以得以通用，只不过是当事者的主观臆断而已。今天回头来看，那时必须引进的，已经不仅仅是西方的技术和制度，而是为了统一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西方化了的社会所必需的国家概念本身。其后半个世纪，即“资本主义垂死阶段的帝国主义”战争时代，在必须普及朴素的富国强兵的国家主义而制造“大东亚共荣圈理论”时，用国学的方法早已无法使之合理化，这是当然的吧。果然，受过德国哲学影响的京都哲学家被“动员”起来，当作重要法宝使用上了。地缘政治学也应用上了。“大东亚共荣圈的理论”等等本来是日本式的东西吗？真是非常时髦的玩艺儿。不管战争的军事结果会怎样，日本及其传统文化的世界史使命之类值得庆贺的事当然不会从这里诞生。回想起来，我依然很怀

念。不过，修禊令我牵挂的，只是两三位心地朴素的文学家。

日本浪漫派虽然象京都的哲学家一样也包含着相当的时髦因素，但是比哲学家干得好。这与在文学领域里没有劲敌有着深刻的关系。战前左翼文学已被镇压、销声匿迹了。所以，当时的文学没有社会性。而且不仅没有社会性，几乎没有继承日本文学传统的任何东西（只要没有继承日本传统的任何东西，那么继承外国的传统问题就不值一谈），在思想方面、在美学方面都几乎没有象背景的背景。作家以一种方言报告着自己的私生活，志愿当作家的人读这些文章，其他人由于：第一，生活不同，第二，关心的对象不同，即使读了也不得要领。这就是战前文学的特点。但是，正当很多人将关心转向战争和为进行战争所必要的天皇制的时候，日本浪漫派恰恰提出了天皇制。而且是在日本文学的历史中提出了天皇制，甚至在从那里抽出独特的修辞法的问题上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应该说，他们的文学具有一种思想的、美学的背景，通过提出大众关心的对象而恢复了同大众的联系。而这样的工作不是通过西方式的逻辑和方法，勿宁说恰恰相反，是通过非合理的、独特的日语修辞法来进行的。所以，把日本文学纯化为日本式的东西，至少作为形式是完整了。——在文学这特殊狭窄的领域里，这样的情况也不是不可能的。尤其在成为问题的文学的思想背景受到政权的保护、当前的读者不将其可信性当作问题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但是这样的条件一旦消失，就是说战争一结束，日本浪漫派要说服怀疑的读者、战胜反驳、捍卫自己的思想立场，在逻辑上便完全没有必要了。这就立即暴露了独特的日本式修辞法，对于战后的所有问题毫无作用了。可以说，企图朝着日本

的传统方向纯化日本文化的日本浪漫派运动，只有依赖于战争期间的特殊条件，才有可能获得一时的成功。它的昙花一现，决不是偶然的，从一开始，它就蕴含着必然以昙花一现而告终的决定性的原因。他们企图以传统的日本文学同西方文学的影响相对立来捍卫传统，这种想法是必然要失败的。因为日本的社会已经西方化到了一定的程度，想要忽视这一事实，归根结底是不可能的。而且，这样的想法必然成为反动，因为要消除西方传来的因素，只有阻挠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想要不成为反动，无论谁在任何时代怎样想方设法去试探，也都会象永井荷风^①所表现出来的典型情况那样，变成对时代和社会的逃避。

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战后日本的“民主化”过程，成了战争期间的国民主义的反面。如果认为那是政权强制进行的，这种看法也是肤浅的。占领军当局至少是强制战争刚刚结束的日本统治阶级实行民主，而不是强制大众。因为强制大众实行大众的权利，作为语言是毫无意义的。但是，战争期间的政权，并不是强制统治阶级实行违反其意志的什么，而是强制大众放弃其当然的权利。战争期间和战后两种政权的性质之不同就在这里。以大众的主观为中心来看，大众在主观上对战争意识形态是抵制的，对民主主义是积极的，这一点未必没有意义吧。事实却并非如此。战争期间，至少在战争开始的时期，大众中的很多人是自己主动接受了战争意识形态的，在主观上并未感到受到了强制。从进行强制的一方来看，大众在主观上没有受到强制之感，不过是强制的方法高明罢了。不能说欺骗得巧妙就不是欺骗。战后的民主不是欺骗，而是使人们

^①永井荷风（1879～1959）：日本小说家、随笔作家。